



丁汝昌研究探微

孙建军 著

华文出版社



丁汝昌研究探微

孙建军 著

华文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汝昌研究探微/孙建军 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4

ISBN7—5075—3732—1

(新世纪文丛 予青主编)

I.丁… II.孙… III.甲午战争—史料—丁汝昌IV.I·1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56119号

书 名	丁汝昌研究探微
著 者	孙建军
责任编辑	张 慧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字 数	182千字
印 张	7.5印张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75-3732-1/I·180
定 价	18.80元

目 录

1886 年北洋舰船长崎油修起因辨析	(1)
丁汝昌筹守大同江始末	(8)
牙山在汉江内口?	(14)
丰岛战前李鸿章四责丁汝昌析	(20)
从丰岛海战的两份战报看丁汝昌之回护方伯谦	(29)
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	(34)
丰岛战后黄海战前丁汝昌五次巡海觅踪	(47)
丁汝昌关于煤的苦恼	(62)
张翼其人其事	(71)
黄海战前北洋舰队护航大东沟行动	
各方调动、集结情况缕述	(75)
丁汝昌用的是什么样的炮弹	(84)
从黄海大战北洋舰队的指挥问题而想到的	(91)
寻找哈富门	(96)
哈富门之有趣	(104)

“北河”与“东北河”考	(110)
甲午旅顺之战丁汝昌日谱	(115)
卫汝成军抵旅时间续考	(138)
汉纳根在北洋舰队的短暂生涯	(142)
马格禄是如何进入李鸿章视线的	(151)
宴汝德献“奇技”破敌闹剧之经过	(157)
戴宗骞事迹记略	(166)
威海卫之战孙万林军援威始末	(175)
“拔丁”记略	(184)
丁汝昌的最后一个春节	(196)
证据法视角下的丁汝昌自杀案	(205)
北洋舰队洋员笔下的丁汝昌	(218)
《丁汝昌集》外函稿抄存	(226)
 单腿走近甲午(后记)	 (228)

1886 年北洋舰船 长崎油修起因辨析

关于 1886 年 8 月“长崎兵捕互斗案”，论者讨论的着眼点大多停留在此案发生的过程及影响，并分析其中北洋舰队将士们的纪律表现；涉及到北洋舰队此行的起因，仅仅一笔带过，惟香港学者马幼垣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其文笔之精彩、辩锋之犀利，颇堪一读。他是这样说的：

“1886 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8 月初，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1836——1895 年）奉命率领甫自德建成来华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和原先已有的‘威远’、‘超勇’、‘扬威’赴朝鲜沿岸巡防，并远至海参崴。回程时，‘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驶往长崎入坞（8 月 9 日到达），因而导发史称‘长崎兵捕互斗案’的意外事件。

且不说漫长的谈判使‘定远’诸舰羁留长崎港，让日人评头品足，事件苟不发生，危害还要更甚。舰只进入外国船坞维修，一切明露，连舰底都展示出来，还有什么秘密可言！除非是极友善，经常互通军秘的国家（如 19 世纪末期以来的英美），此类事之应尽量避免，不待细表。倘遇两国关系欠和（中日两国早因朝鲜、琉球、台湾问题发生过冲突），即使动干戈的可能不过百分之一二，更不容如此莽举。西方海军宁可沉舰，也不能泄密之例，史不绝书，便是这原因。那有自动把

崭新的主要舰只送去关系紧张的国家的船坞,让对方细验的道理?丁汝昌及其所倚重的副手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4 年)不致故意通敌,但彼等愚笨误国之失是不必代辩的。

如谓往长崎入坞令出北洋大臣李鸿章,诸将不过遵命行事,亦不能为彼等洗脱罪名。北洋海军仅是李鸿章日理万机的一部分,军中日常运行不可能事事待决于他。何舰该何时入坞,何坞适合何舰,这类周期性、技术性的事尽管需李鸿章作最后决定,原先的要求必发自军中。就算长崎入坞的构思果原出李鸿章(或谓旨在炫耀,期收吓阻之效,但访问港湾不过让民众观看,进坞却是给专家细验,性质根本不同),丁汝昌等亦绝对有直陈厉害,据理力争的责任。现在看来,长崎入坞仅是如果不发生斗殴意外,就几乎不值一提之事。决往长崎前,未闻将领之间有辩论,未闻诸将与李鸿章之间有争议。彼等之缄默,有两个解释:(一)北洋海军将领不明白此举之危害性;(二)诸将虽明白此举之不应为,为了自己前途,谁也不愿逆李鸿章意。不论实情如何,此事显示主国者和治军者同样缺乏当此等职务所必须具备的胆识和本事。”^[1]

上述文字,分析周到,可谓鞭辟入里。但是,对丁汝昌和刘步蟾、林泰曾的所谓“不明此举之危害”而“愚笨误国”的指责,实在是言重了。对一个事件的分析,如果不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分析愈周密、论证愈铿锵有力,得出的结论就愈可能离题万里。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北洋

[1] 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清华学报》,新二十四卷第三期(1994 年 9 月),第 297~298 页。又见,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版,第 54~55 页。

舰船长崎之行的来龙去脉。

1886年5月上旬,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水陆诸军。事毕,“镇远”管带林泰曾就向丁汝昌报告:“该船吊雷艇木架铁夹伤损,未能合用”。丁汝昌即向刘含芳提出请求“贵局代制壹个,以便从速起艇”^{〔2〕}。此事虽非肇端,但说明定远、镇远并非“崭新的主要舰只”就不必修理了。

舰船是需要定期维修的,诸如刮底、涂油之类。无奈,清国旅顺船坞尚在建设中,无大坞能够承修定、镇二艘巨型舰船,丁汝昌不得不另想办法。1886年6月23日,丁汝昌连发两信,一给罗丰禄,一致德瑾琳。全是催问此前商定的联系香港祥生船厂坞修定、镇二舰的联系结果问题。丁汝昌在给德瑾琳的信中说:“敝军定、镇急须筹备进坞,前执事云香港有坞,曾允电商,刻下计当得有回电。可否之处,希即通告,递交烟台新关存交,俾可早为定夺,免致临时瞻顾有误”。^{〔3〕}在给罗丰禄的信里,丁汝昌催问的是同一件事情,并要求船厂提供船舶保险:“定、镇两舰须速筹备进坞。前合执事暨郁山(周馥)观察会电眉叔(马建忠),妥商祥生厂是否出据能保该两船入坞无碍一节,刻下曾接回电与否?得有确信,方可豫为定夺,免届时瞻顾有误。倘仍未来复电,仍祈从速电催,能否之处,必须一言为定”。^{〔4〕}在接到香港祥生船厂的答复后,丁汝昌于6月24日致电周馥,表示自己的担心:“伏念祥生厂坞初次承人此等巨舰,所可虑者坞基质弱,设有不测,患即匪鲜。设该厂诚有

〔2〕《致茅林》(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7页。

〔3〕《致德税司》(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二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8页。

〔4〕《致罗纮臣》(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二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9页。

把握,允以此两铁舰制价保险,自可照办。”^[5]

7月9日,丁汝昌在接到德璀琳电告其祥生船厂接修铁甲舰的困难后,即回电表示:“昨奉答章,谓香港坞尚须改造坞底龙骨等事,当即会商琅公威理,据云彼已知该坞不能入此巨舰,船图似亦未便轻与人看,只得暂作罢论”^[6]。而事实上定、镇二舰也已经不能去香港了,因为同一天,丁汝昌在结束勘察胶州湾后,即奉命将要东巡朝鲜。他在给刘含芳的信里说:“今抵烟台装添煤斤,一经至齐,即带同各舰巡阅勾丽东鄙一带口岸。”^[7]

此时,丁汝昌的任务是到朝鲜东部沿海“巡阅”。7月12日,李鸿章在电报中提出了舰队到海参崴接吴大澂和舰船到长崎油修的问题:“前袁世凯电:初四有俄兵船由元山赴永兴湾,顷又接袁电:我船如东去,凯拟约韩臣同赴永兴,查看形势,议开口岸。汝何日可抵元山?应电袁酌办。吴钦差函称:俄勘界巴使,颇愿我船至海参崴游历。到崴后,可径由崴电吴,届时酌定,几船内渡,几船赴崎油修甚妥。”^[8]此电似乎李鸿章还是在商量丁汝昌的语气,而7月14日李鸿章的口气就是不容置疑的了:“丁汝昌同琅威理自胶州湾回烟台装煤,即带铁舰快船赴朝釜山、元山。闻俄船窥伺永兴湾,拟令由元山驶巡永兴,聊作声势。吴大澂俄界勘定,欲由海参崴乘我兵船内渡,永兴距海参崴不甚远,各船即往崴游历,顺便接

[5]《致周郁山》(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三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9页。

[6]《致德璀琳》(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60页。

[7]《致刘芾林》(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60页。

[8]《烟台交丁、琅提督》(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酉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38页。

吴。铁舰须上坞油修，俟由崑折赴日本之长崎，酌量进坞。”^[9]但这里“旨在炫耀，期收吓阻之效”的是针对俄国，而不是日本。

但是，定、镇二舰的维修问题似乎并未最终决定，中间还有反复。7月18日，在给袁保龄的信里，丁汝昌谈到：六船往海参崴迎接吴大澂，归途“届有缺煤之船，即赴长崎装添，余船均从使节（吴大澂）内渡。修船一节，尚未执定也。”^[10]可见，至此时，在丁汝昌的日程表上，北洋舰队往长崎仅仅是给缺煤的舰只添煤而已。

到了7月25日，整个行动安排已经明晰。丁汝昌从朝鲜元山发给吴大澂的信中，报告了自己的行程和下一步计划：他带领战舰6艘，“十七日由威海展轮，二十日到釜山，二十二日到元山，测量元山湾一带港道。定7月朔仍带同六艘由元山赴崑恭过星旆，籍资阅历。惟六船中有数艘须就近至长崎刮、油船底，并装添煤斤等事。宪台行期若近，当泊崑数日，籍效前驱，一并南发，过釜山后再分道而东。设起节尚有时日，拟抽超、扬两快船牢泊海参崴，听候钧命。则总兵到崑后，仅二三日测对港道，即留超、扬驻崑守候，其余四艘当先带赴长崎勾当一切。”^[11]按照吴大澂给李鸿章的电报，丁汝昌也正是按照上述计划行动的，“（七月）初七送徽至摩阔崑，次日开赴长崎进坞修理，留‘超武〈勇〉’、‘扬威’在海参崴等候。”^[12]9日，四舰抵长崎。16日，丁汝昌急电李鸿章报告了“长崎兵捕互斗案”的经过：“水兵先与日捕口角，十六，水手放假，二成

[9]《烟台交丁、琅提督》（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展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38页。

[10]《致袁子九观察》（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63~64页。

[11]《慕清帅》（光绪十二年六月廿四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65~66页。

[12]《寄译署特呈醇邸》（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展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39页。

登岸，散在各街买物。至八点余，日巡查多人近前寻衅，日捕数百将街巷堵住，逢人便斫，满街民持刀追杀，致死五名，重伤六名，轻伤三十八名，无下落五。”^{〔13〕}

综观丁汝昌他们上述行动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

一、舰船是需要定期油修的，当时的通例应当是铁甲舰每半年要上船坞一次刮底、刷油。但对于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即使是这样的例行维修，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就是要有能够承修如此庞大的铁甲舰的船坞，中国沿海尚找不到这样一处船坞能够“承人此等巨舰”。为容纳大型军舰而准备的旅顺船坞是 1880 年开始建设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1886 年 10 月开始向外国公司招标承建，此时船澳船坞离投入使用的目标尚远。“何坞适合何舰，这类周期性、技术性的问题”，恰恰是大清国能力解决不了的。

二、丁汝昌他们首先选择的不是日本长崎，而是香港的祥生船厂。在香港的祥生船厂也不具备承修条件的情况下，丁汝昌他们仍然没有马上想到要到日本长崎去维修；罗丰禄是伴随李鸿章身边、比较有办法之人，德璀琳时任天津税务司，在德璀琳、罗丰禄联系香港失败后，舰船不能不修，才转往日本长崎。这其中究竟是谁又帮助联系的日本，因目前尚无资料支持，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总之，此举乃是丁汝昌他们的第二或者最后的选择。

三、北洋舰船到日本长崎维修，也算不得什么“莽举”，只不过是出于经济考虑，就是顺路而为。丁汝昌他们前往海参崴之后的归途，到长崎顺便加煤，并进行油修，这在当时舰队本是平常事一桩，大可不必“将士之间有辩论”，“诸将与李鸿章之间有争议”更属添足之举。这次行动，无资料可以显示：“李鸿章把铁甲舰送到

〔13〕《寄日本徐使》（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酉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月版，第 239 页。

日本油修,其中本含有威慑的意图。”^{〔14〕}“如果不发生斗殴意外,就几乎(是)不值得一提之事。”至于事件发生后,日本战争狂人煽起民众的仇华情绪,完全是借机推行他们由来已久的侵华政策而已。

四、铁甲舰在日本长崎油修,无所谓“让对方细验”暴露秘密的问题。在蒸汽舰时代,舰船的先进与否,主要体现在蒸汽机和大炮上,并无多少技术含量;船舶设计制造基本上都是公开透明,济远、致远、经远等舰制造过程中,英、德两国船厂互相借鉴、改进,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并无秘密可言。^{〔15〕}二铁甲舰进入长崎船坞维修,即使“一切明露,连舰底都展示出来”,日本人也不会窃取那些公开的“秘密”的。“事件苟不发生,危害还要更甚”乃至“误国”的说法,是有些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五、对于船舶不按时维修保养的危害,“丁汝昌等亦绝对有直陈厉害,据理力争的责任”。对于舰船应当如何维修,何时维修,何处能够维修,丁汝昌等人确实知道,“保险”、“坞基”、“船图”等都想到了,且就相关事情已“会商琅公威理”。我们从上面所述已经可以看出,丁汝昌他们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我们可以遍点当时大清国中的人物,谁又是具备“当此等职务所必须具备的胆识和本事”的人呢?假设有这样一个人,难道他要把铁甲舰开到西欧去刮船底、刷油漆吗?西方的哪一个国家又是“极友善”国家呢!

〔14〕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331页。又见,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1页。

〔15〕“海军是自十九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展最快的兵种,起码就十九世纪后半来说,军秘意识并不浓厚,潮流所吹反而是夸耀自己的新发展,故增进新知是相当容易的事。”“那些船厂为了招徕生意,不单会宣传自己的产品如何优越,也会指出别厂产品的弱点,舰尺的数据也就无秘密可言。”马幼垣:《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逆购外舰始末》(下),《九州学林》,2005年秋季三卷三期,第179页。

丁汝昌筹守大同江始末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丁汝昌积极备战，催燃煤、弹药，提醒有关部门整顿通讯、防止日谍活动。在按照李鸿章指示布置牙山防务的同时，他审时度势，提出了自己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战守构想。

丁汝昌根据自己对朝鲜半岛地形的熟知，从朝鲜即将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这一前提出发，围绕着大同江口基地的建立，对水、陆军的战、守、调运和后勤军需保障，提出了一个全局性的、有远见的计划。他指出，大同江口实为清军战守的“要键”，应当尽快在此建立海、陆协守的基地。但是，由于他积极主动备战表现出了“求战”的欲望，与李鸿章保全和局的幻想大相径庭，遭到了李鸿章的屡屡申斥，使得他在李鸿章面前不敢讲话，不能畅所欲言。但出于一个军人的责任感，丁汝昌不能保持沉默而求自保。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多次试图通过李鸿章身边的亲信幕僚转达，恳求他们说服李鸿章。

6月31日，他致电张士珩（楚宝）：“前派兵去韩，为平匪起见。现乱已解，我兵驻牙，似不相宜。倭衅已露，汉江一路，彼已先踞。牙山水路接济较难，即由北路进去韩京，亦为倭阻，难以联络。现若阳言匪散，牙兵撤防，一面改扎大同江，赶鱼雷、水雷船只，并接电至平壤，抢先布置，严守要地，免韩沿海尽被占先，继有大队由义

州进剿，方无隔阂，水陆军需亦易周转。此系大帅权衡，何敢参议。惟时局所系，难守缄默。倘帅与公商酌，便中代陈备采。”^{〔1〕}

同时，他还向即将被派往平壤的大连湾守将刘盛休（子微）谈了同样的意见：“倭寇军情，据前驻韩船先后辑录大略，汇开清摺，并译绘高丽全图一张，派船送旅叫贵差驰呈密察，以备缓筹之采。大队会剿，车马辎重若多，似由凤凰门进队，以义州为后路转运，平壤为中路转运，扼要分队堵守，前军长驱，庶为稳着。若悉由水路载往，设不便由内口登岸，遇风驳运则克日难期，不无匆遽沓纷、猝手不及之虑。未必果遽臻此，然不得不预事周计也。根基立定，日后转运，由鸭绿江续运，当无可虞。”^{〔2〕}

为了争取自己的建议能够上达李鸿章，丁汝昌于7月11日再次致书张士珩，重申自己的建议：“若进大队，似由凤凰门、大同江两路会剿，后路易固，接应转运不虞隔阂，前军长驱无后顾之忧。水师抽数舰占据大同，以大队游击之师周回韩境西北一带海面，向<相>继御剿，较为稳着。”^{〔3〕}

这些主张显然不会被李鸿章采纳，因为李鸿章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冒险的野心，正在大力运动列强出面干预。但是，丁汝昌坚信自己的意见终将被采纳，“未尝搁歇此志”，“四处函索电搜”^{〔4〕}地向各部门求告，商调水雷等，在弹药不足、煤运不到的情况，艰难

〔1〕《军械总局张大人鑒》（光绪二十年五月廿八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35页。

〔2〕《致刘子微》（光绪二十年六月），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01页。

〔3〕《致张楚宝》（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03页。

〔4〕《复鲁卿》（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七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13页。

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到了7月牙山事急,李鸿章决定将叶志超军海运至平壤,才由盛宣怀于7月15日通知丁汝昌:“公与楚宝函,舍汉江守大同,相首肯。”^{〔5〕}而此时的李鸿章有些张皇失措,电示丁汝昌:“叶军现居绝地可危,拟十六派商轮大小五只往牙,将全队下船,驶洋后绕赴大同江,移扎平壤。必须兵船五只护往,即留该兵船守江口,以便盛军续往。此为目前最要最急之事,望密派定,俟商轮过威同行。”^{〔6〕}第二天又强调:“汝必须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口,担保必无他虞,我与叶始敢放胆为之。若但以游弋护迎为词,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7〕}但是,此时的李鸿章事实上仍没有认真地考虑丁汝昌的意见,而仅仅是为了将叶志超军转移至平壤而已,并未采纳丁汝昌建立大同江口防务基地的计划。

虽然这个部署距离丁汝昌的设想依然很远,但丁汝昌仍想借此机会,推动一下自己关于建立大同江基地的计划。7月21日,他致电龚照珩,催调水雷配件并重申自己的观点:“前由津领取水雷,备随大队着‘利运’装赴大同江守口之用。查其中尚缺至不可少之件计四十宗,若不搜补齐全,则已领到者全为废物。曾于初七开摺函达楚宝请补,事越旬余,未见一寄。如此延缓,料必无存。顷闻贵处局储除用之外,充富仍多。兹开清摺专船着王平前往走领。知我同袍素敦公谊,必慨然以余波及晋也。微此,则战事一

〔5〕《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威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65页。

〔6〕《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酉刻),威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64页。

〔7〕《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酉刻),威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65页。

举,大同防具中无此首要,口门豁达,岂抽数十舰足资扼守乎。因缺微需,失此要键,他族中梗,且大意中微志所存,又落后着,岂非可惜!故不憚唇疲齿竭之烦,而呼吁他山亟为之助也。”^[8]

第二天,他又再次提醒盛宣怀、张士珩等李鸿章的幕僚:“惟大同一口,既为东征水军后路,又出关陆队中樞要纽,不及时水陆赶筹协守,良多未妥。两仲卓见,望便达帅定计,果允速举,则由平壤至铁岛一段电线,甚宜予筹添设。”^[9]

尽管丁汝昌“不憚唇疲齿竭之烦”,但并未引起李鸿章的重视,即如他的亲信幕僚如盛宣怀、张士珩等也是等闲视之。^[10] 所以,当叶志超军水运转移平壤的计划被取消后,丁汝昌的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随即也被束之高阁了。直到牙山海、陆两败,且有“倭派兵船赴大同江”的消息,李鸿章才又慌忙于8月6日下令丁汝昌:“汝须预备带船前往击逐,仍留船驻扼,多设水雷。”^[11]

而此时,丁汝昌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水雷等武器也调转不动。8月7日,他在给龚照珩的一封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无可奈何:“大同江一口,当肇衅之始,叠经电请,并屡函楚宝愚为代陈,预筹水陆进踞协守,实见此着,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防守该口之

[8]《复龚杏卿》(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戚继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07页。

[9]《致岑春煊、楚宝》(光绪二十年六月廿日),戚继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08页。

[10]丁汝昌的建议得到一些前敌军事将领的赞同,如宋庆在7月4日就表示:“前丁议由北路进,甚是。盖牙山下岸甚险,……”(宋庆门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展刻到),《李鸿章全奏》,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版,第746页。

[11]《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和三十日刊),戚继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15页。

具，必期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遂从此四处函索电搜，虽未尝搁歇此志，而阅期将近一月，所筹亦不过聊堪固圉耳。今内意事到临头，遽以赴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雷，而水雷究何从出耶？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再，水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麻计之，现仅得有十艘。兹者，似以东路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兼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又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12]

牢骚归牢骚，困难只能自己想法解决，朝中的言官们不会施以同情，李鸿章也根本不管“水雷究何从出”之类的问题。所以，当丁汝昌再次提议调遣鱼雷艇布雷、和陆军协守大同江口时，李鸿章还显得十分地不耐烦了：“虞电筹守大同江繁难，未尽稳妥。各口雷营均正防守，岂能遽挪下雷？小火轮岂能远行？留一二船协守，必蹈牙山覆辙。卫、马各军本单，距口尚远，岂能分扎？汝为提督，于此等筹议，强人所难，不明大局。”李鸿章把困难摆的很充足，驳回了丁汝昌的建议。接着又下达了决定：“鄙意应统大队，由威径赴大同江口一带游巡，于口内外相机击逐倭轮及运兵船，并就近赴鸭绿江巡查，俾倭船不敢肆行窜扰，再转回威。一月内必须两次，则我局势稍固矣。”^[13]

对于这样的部署，丁汝昌大概只能大摇其头了。可叹的是，丁汝昌一面承受着言官的弹劾和李鸿章“倭快船岂能遽入北洋？学生胆怯，汝亦随之”^[14]的指责，一面还接到李鸿章8月8日这天的

[12]《复鲁卿》（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13页。

[13]《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八日卯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71~272页。

[14]《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八日申刻），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72页。